

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理念的百年演变及经验

李佳金

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立德树人理念经历了5个阶段的演变。革命战争年代,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青年”是立德树人的首要标准。从延安兴办高等教育开始,党对于立德内涵和树人方式的探索开始成型,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底色、批判吸收传统文化的道德形态,并采用了实践优先的教育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渐形成了“又红又专”的育人标准,树人方针则在实践性和理论性之间反复调整。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高度强调理想信念教育,同时开启了教育现代化的树人方式。进入新时代,立德内涵在历史基础上有了较大调整,传统文化的地位从“历史遗产”上升为“文化基因”,树人方针则更具政治性、时代性。这种既有继承、又根据时代有所发展的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强大生命力的思想源泉。

关键词 立德树人;高等教育;延安;思政课

立德树人是一个当代概念,但背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教育理念横亘了党史百年历程。站在当下回观历史,会发现中国共产党百年立德树人理念经历了5个历史阶段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立德的核心内涵一以贯之,即“核心价值观”^[1]始终未变;而立德的外延、树人方针则根据不同时代需求在不断调整。

1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立德树人理念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道德”的论述大

多带有批判色彩,特别是对于“资产阶级道德”及其阶级性的批判。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无论是道德还是“宗教感情”^[2],本质上都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塑造的产物。在批判旧道德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只有在超越阶级范畴后,才能真正成为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道德。恩格斯指出,道德“或者是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而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历史条件下,“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3]。

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对道

收稿日期:2021-05-27;修回日期:2021-06-08

基金项目: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重大培育项目(2020ZDJG004)

作者简介:李佳金,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电子信箱:6120190106@bit.edu.cn

引用格式:李佳金. 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理念的百年演变及经验[J]. 科技导报, 2021, 39(12): 45-50;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21.12.006

德的批判态度。在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许多党内知识分子著文对道德的阶级性进行批判。如李达指出,道德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因为它以文化秩序保证了“田主每日毫不劳力,专门掠夺佃户劳力所得的结果”^[4]，“无土地的农民要尊敬有土地的领主,贡献其力役、粟米与布帛”“人民若不遵守这样的礼,便是犯上作乱,就要被刑所制裁”^[5]。因而传统道德本质上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剥削阶级的道德。

应该指出,中国共产党早期对道德的批判,是更广阔的社会意识批判的一个子课题,而社会意识又包括道德、宗教等。因此,与其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专门批判道德,不如说是在批判整个旧社会的社会意识。

在批判旧道德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战争中逐渐对立德树人展开探索,确立了以“革命青年”为目标的思想教育方针。1925年中共五大召开,《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中提到,“扩大共产党主义的宣传”到“革命青年群众中去”“吸收他们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积极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各种斗争”^[6]。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更是有一部分专门讨论“红军党内青年组织”问题,如“不同的情绪”“特受一种青年教育”等问题,还做出在党内成立青年工作会议的决定。可以说,在整个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立德树人工作都是围绕培养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服务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的“革命青年”展开的。

2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立德树人理念

延安时期,经过兴办高等教育的经验积累,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理念基本成型:由原先围绕培养“革命青年”的整体性目标,逐渐发展为融合了传统文化的、实践性优先的立德树人理念。

首先是“立德树人”理念中“德”的内涵有所丰富:它比起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公有制等内容,又增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

取其精华。1938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要学习传统文化,“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7]。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无条件地吸收,而是要有条件地批判继承。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具体解释了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去除一切奴化思想、迷信思想的糟粕,保留其中具备“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符合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文化精华。

其次是“立德树人”的方式在争论中逐渐明确,建立起一种实践性优先的育人方式。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口号下,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等一大批延安高等院校培养人才有了新的定位。在此之前,关于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办学方针曾有“理论与实践”之争:既然要办大学,要偏重理论教育还是偏重实践操作呢?如自然科学学院生物系主任乐天宇认为,经院式的教育和抽象的名词会让学生“夹着书本,在工厂、农场的大门外彷徨着”^[8]。但另一方面,有人认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对于科学研究是必须的,如生物系的教员康迪认为,“基本科学是应用科学与理论科学的基础,是必要的开步走的理论知识”“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而造成损失的事例屡见不鲜”^[9]。这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各有依据,但在延安的艰苦条件和抗日战争的迫切背景下,重实践的教育方针更符合当时的历史需求。1942年自然科学学院的科系调整后,一种更加面向生产建设实践、面向人民群众的教育方针最终确立:培养“革命通人,业务专家”。这是整个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方式的一个缩影。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立德树人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安的13年历史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源泉。在立德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基本延续了延安时期的立

德内涵:以马克思主义为底色、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需求的推动下,立德的外延有所丰富:专业才能受到重视,“德才”二元辩证关系正式形成。而高等教育的树人方针在学院式与田野式教育之间不断调整。

首先是“德”的内涵,虽无重大变化,但是外延却有所扩大,“专”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展开,迅速成为重要的用人标准,它与“德”也就是“红”一起,构成了一直延续至今的“红”与“专”的二元辩证关系。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首次比较全面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培养人才的标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在“德智体”标准中,“德”即“有社会主义觉悟”,具有第一优先性,之后才是业务上的专业性。

其次是树人方式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高等教育事业,经历了从继承延安经验到学习苏联模式、再回归延安经验的转变。1951年开始,高等教育开始学习苏联模式,开始强调培养正规化、专业化的各类专业人才,以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进行了院系调整、建立了以专业培养为中心的教学制度,整体教育方式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但是自1957年开始,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帮助中国搞建设的大批专家,同时,苏联强调专业化、理论化的教育方针,也与我们日益强调实践、服务革命的教育方针相违背。自此以后,国家重新结合延安经验,进行了实践性优先的树人方式的探索,号召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劳动教育相结合,在服务革命、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学习知识。

4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立德树人理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新的时代需求下,立德内涵

与外延的重点发生转换,树人方针也向教育现代化进行调整,最终形成了“四有新人”的培育标准。

首先是在时代需求的推动下,原先立德内涵与外延的关系,即“德才”关系,发生了思路转换: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从一种优先性的标准,转变为一种底线思维。1985年,邓小平在《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中指出,“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10]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对“德才”关系,或者说“红专”关系的表述也相应发生变化,更强调专业技术知识的重要性。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指出,“专并不等于红,但红一定要专。”^[11]1983年以后,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开展,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既不同于毛泽东时代“又红又专”、又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专”优先的新概念:“四有”标准,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其次是树人方式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985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等,其核心是减少政府对高校的刚性管理,填补十年动乱时期带来的人才匮乏问题,使教育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相匹配。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逐渐由原来的补足教育数量,向提升教育质量转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包括加强基础研究领域、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等一系列举措,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改革向纵深发展。

5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立德树人理念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新时代办教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12],强调了立德树人的重要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发展进入全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发生转变,“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自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变化,表明新时代最紧迫的任务已经从高歌猛进式的全面发展,转变为调节收入分配,保障人民平衡充分的幸福。新时代的“百年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下,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理念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首先是立德树人的内涵中,传统文化进一步深入,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座谈会上指出,儒家、法家等“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1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4]。我们继承了延安时期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态度,但同时根据新时代的需求,对传统文化的地位进行了调整,不再将其作为一种外在的经验来源,而是作为中国人从五千年历史传承而来的、深入到中国人灵魂中的文化根源,是我们的基因、血脉和精神命脉。例如,中华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以及“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还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对于个人品格的论述,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以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深刻社会思想。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留给当代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

其次,是树人方式更加全面,特别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新时代,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任务进入平台期。第一,高校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和国内各种错误思潮涌现的双重挑战,为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带来严重干扰。第二,现代国际竞争中培养专业技术知识人才已经成为基本门槛,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壁垒时,培养尖端科技人才越来越紧迫。第三,高等教育的教育对象和环境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大量“零零后”成为校园主体,伴随他们成长的新媒体环境、社会思潮多元化,仅仅依靠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已经很难进行思想引导。这就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严格抓好高等院校的思政课。新时代立德树人过程中,讲政治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和要求。高等教育是铸魂育人的关键领域。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要求培养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任务的人才必须首先讲政治,明确“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指出,“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思想政治课教育,曾经开设列宁小学、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学府,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而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思政课要在这个时期引导学生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在该背景下,国家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进程。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印发,提出2035年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等重大远景目标,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中长期战略规划。

6 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理念百年演变的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立德树人概念、德的具体内容、树人的目标要求,在不同时期有不同

表述,但立德树人的基本思路是一以贯之的,即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我们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理念的百年演变中,立德的核心内涵始终不变:即强调讲政治、有理想、有觉悟是始终一以贯之的,这解决的是培养人才为谁服务的问题,即“为谁培养人”问题。从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将政治观点摆在首位,到新时期“四有”标准中首要就是“有理想”,再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的历史中没有放松讲政治的基本标准。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素养的体现。

同时,中国共产党能够灵活审视时代需求,主动对立德的外延、乃至树人方针进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即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能够根据时代需求不断调整。例如,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政治军事斗争,所以“树人”过程中,讲政治的要求较常规科学文化知识更加迫切,而且政治标准往往占有绝对优先性,甚至可以代替业务标准。在延安时期,在面临封锁的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的立德树人方针更多是围绕服务革命战争、服务生产生活进行的,抗日军政大学、自然科学学院等高等院校为根据地度过困难时期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庞大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迫切需要有扎实的基础理论教育、高度专业化的人才,所以高等教育办学方针逐渐向培养专业人才转轨。从1951年开始,中国高等教育向苏联学习,为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输送了大量扎实的专业人才。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先是出于时代需求将“专”提到优先地位,后来又进行调整把“理想信念”放在第一位,最终形成了立德树人的“四有”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不再被当成一种简单的历史遗产,而是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生创造性源泉,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文化基因”,这是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7 结论

中国共产党百年立德树人的历史,就是党在不断探索、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历史。从历史演变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既能守住不变的“初心”,又能随时代具体任务而调整“创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主要是在批判道德的阶级性、在批判社会意识的宏观命题下批判封建道德形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式开始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道德形态,将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道德论,同时也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育人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培养,形成了“又红又专”的立德树人标准表述,育人方式也逐渐向现代化转变,中间也经历过一些曲折探索;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解决对外开放过程中带来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中国共产党高度强调理想信念教育,同时提出了教育现代化口号,形成了“四有新人”的总体标准;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立德树人问题,提出了在2035年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还特别强调了思政课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传统文化在立德树人过程中的作用,主张发挥传统文化“文化基因”的作用,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15],让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这种守正与创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强大生命力,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沧桑而愈发具有生命力的力量源泉。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习近平.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4.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6.
- [3] 恩格斯. 反杜林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97.
- [4] 李达. 李达文集[M]. 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47.
- [5] 李达. 法理学大纲[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84: 110.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三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09.
- [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534.
- [8] 乐天宇. 读《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N]. 解放日报, 1942-07-23(4).
- [9] 康迪. 对乐天宇同志读《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之商榷[N]. 解放日报, 1942-09-25(4).
- [10]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10.
- [1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39.
- [12]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9.
- [13]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12.
- [1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70.
- [15]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7.

The history and experience of CCP's moral education since foundation

LI Jiaji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In the hundred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ncept of the moral education has undergone five stages of 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years, cultivating the "revolutionary youth" with the communist consciousness is the primary concern for moralit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in Yan'an, the party's explor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morality and the way of fostering people began to take shape, with a moral form based on Marxism establish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criticized and absorbed, and a practice-first education method adopte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d and professional" standard is gradually formed for educating people, and the policy of cultivating people was repeatedly adjusted between a practical goal and a theoretical on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ighly emphasized the educa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and at the same time opened the way of fostering people in th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Entering the new era, the connotation of Lide has been greatly adjusted on the basis of history, the status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risen from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to the "cultural gene", and the policy of fostering people has become more political and contemporary. This characteristic, which i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with the times, is the sourc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maintain the strong vitality of a Marxist party.

Keywords moral education; college education; Yan'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



(责任编辑 徐丽娇)